

# 记忆中的父亲

□吴言



竹扁担压着父亲肩膀时发出的沉闷的“咯吱”声，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深的烙印。

天还没亮透，他便套上那件几乎褪尽了颜色的蓝布褂子。沉重的盐担子压下去的一瞬，他背上的骨头一节节清晰地凸起，宛如那根被岁月磨得油亮的扁担上的竹节。

海边的盐场，没有城里人说的春夏秋冬。父亲的日子，是从鸡叫头遍开始，到天黑透了才拖着沉沉的身子回家。

夏天天亮得早，活计也多。放暑假时，母亲常打发我去盐场给父亲送点心。盐场在海边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全是白花花的盐田。我常蹲在晾盐棚窄窄的阴影里，看他干活。他用的盐耙子，木柄被汗水浸透，磨得光滑，缠着防滑的粗麻绳。盐耙子在他手下翻动，盐粒哗啦啦地响，像一阵细密的小雨。日头越来越毒，他把头上的破草帽摘下来，扣在我脑袋上，自己光着头，继续一下一下地耙着盐。后脖颈晒得通红，暴了皮，盐粒落上去，就粘在那些细小的伤口上。汗水顺着他古铜色的脊梁沟往下淌，掉在盐堆上，晒出一个个深色的小窝。盐粒常常沾满他全身，在皮肤上结成薄薄一层，连眉毛都染上了白霜，整个人像是刚从盐堆里捞出来。

父亲干活是出了名的实在，盐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盐垛”。两百斤的盐包，他扛起来就走，腰杆挺得直直的。有一回，我帮他擦汗，手碰到他胳膊上的腱子肉，硬邦邦的，就像盐滩旁边那些被海水冲刷得黝黑发亮的礁石。

可这副硬朗的身板里，偏偏藏着一个不善言辞甚至有些羞怯的灵魂。

18岁那年，我在外地读书，生日恰逢放假回家。父母张罗了一桌好菜，几个要好的同学挤在我家那张油漆斑驳的八仙桌前，说说笑笑，很是热闹。母亲特意杀了家里养的老母鸡，炖得金黄，油花儿在汤面上打着转。父亲一直在厨房里外忙活，给母亲打下手，不是蹲在灶口添柴火，就是择菜洗菜。从开席到结束，他始终没上桌。母亲喊他，他只说灶上离不开人。后来我去灶房取酒，撞见他蹲在昏暗的灶角，正用筷子专注地剔着我们吃剩的鸡骨头。白炽灯昏黄的光，把他佝偻的影子拉得老长，投在斑驳的土墙上。我喉头猛地一哽，刚想出声，他却像被烫着似的，慌忙抹了

下嘴，低声说：“我看……这上头还有不少肉，扔了怪可惜的。”

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那年盐场收成差得厉害，家里已经3个多月没沾过荤腥了。那只鸡，是父亲向邻居赊来的。

10年后，我在城里买了第一套房子。装修时，父亲带着他那条老扁担和一对磨秃了边的土箕，从老家风尘仆仆赶来。六月的毒日头底下，他光着膀子，把一担担沉甸甸的砖头和沙子往六楼挑。楼道狭窄，一趟趟上下，空手走都喘气，何况肩上压着重担。砖石的碎屑混着汗水，沾满他赤裸的脊背和肩膀，那片皮肤被扁担磨得通红，分不清是压红的，还是被砖粉染红的。

中午，我想带他去小区门口的饭馆吃饭。他隔着玻璃门瞅了一眼里面锃亮的地板砖和整齐的桌椅，死活不肯进去。“费那钱干啥？给我俩馒头就行。”最后，我在快餐店买了简单的饭菜，坐在楼道里堆积的水泥袋上，捧着一一次性饭盒吃。他大口扒拉着米饭，咧嘴笑着说：“这比家里八仙桌还自在。”

前几年，我翻新书房，换了个大书柜。70多岁的父亲非要和年轻力壮的装修工一起抬。我听见他憋着气，喉咙里发出闷闷的哼声，像一艘搁浅的老船在做最后的挣扎。午后的阳光斜照进来，清晰地照亮了他后颈——那曾经沾满盐霜的地方，如今覆盖着真正花白的头发，像极了盐田边上被烈日晒得干枯卷曲的芦苇。那双曾经能轻松扛起整个麻袋的臂膀，如今抬个书柜，竟也显得那样吃力，那样迟缓。

前些天收拾旧物，翻出一个父亲当年的旧证件。蓝色的塑料封皮已经磨损，照片上是个抿着嘴的年轻汉子，眼神躲闪着镜头，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拘谨。证件内页里，密密麻麻记满了出工的天数，那些数字，像撒在粗黄纸上的盐粒。证件底层，压着一张同样泛黄的奖状，“先进生产者”几个金粉字已经剥落模糊。奖状保存得很好，连边角都没一道折痕。

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恍惚间，我又看见盐场暮色中那个挑着盐担的背影，像一辆沉重的手拉车，吱吱呀呀地，碾过了40多年沉默的光阴。他一生都在搬运着这些雪白的晶体，自身却像一粒最沉默的盐，沉在最深的水底，只留下生活深处，那一抹无法冲淡的咸。

# 难忘楼道里那盏邻里灯

□翁盈昌

梅雨淅淅沥沥落在小区门口的老樟树上，嫩叶沙沙作响，将雨水筛成细碎的银箔。我站在新家的屋檐下，看雨帘从黛瓦边缘垂落，恍惚间，记忆便沿着潮湿的砖瓦缝隙，漫溯回那些与老邻居共度的时光。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”，2019年正月初二的傍晚，本该是团圆守岁的时刻，我家卫生间却上演了一场“水患”——天花板如漏筛般滴落水珠，地面泛着浑浊的涟漪，恰似“上檐垂玉线，下地漏珠盘”。紧急联系的管道工摸黑赶来，在管道中忙活一小时未果，最终叹着气摆手：“这管道堵得太死，难弄。”他刚跨出大门，卫生间的天花板突然如破堤般“大雨倾盆”，积水迅速漫过脚踝。楼下若被殃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老伴本就因子女远在别处而心急如焚，此刻血压骤升至一百七八十，拖着骨折初愈的病体，颤抖着敲响了楼道小组长的家门。

史组长时年63岁，是退休多年的共产党员。听闻险情，她二话不说来到我家，站上方凳卸卫生间顶灯。“小心漏电！”她丈夫举着手电筒，光束在污水中晃出斑驳的影。污水如断线珍珠般淋落，渍得她满脸都是，顺着领口、袖口渗进衣襟，甚至流入唇齿间。我过意不去，递上雨衣时，她的棉袄已浸湿了。

新年叫楼道小组长帮忙，我俩十分内疚。史组长却道：“阿姨，你没有急事不会来找我；你不信任我，也不会来找我。你想到我，我理应上门。今后只要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你尽管说。”这话似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春雨，悄然熨帖了焦灼的心。

次日清晨，楼下人家气冲冲推门而入：“你家怎么搞的，把我家漏得一塌糊涂，像水帘洞那样。”可看到我家更狼狽的景象，又不好意思地挠头：“怕是总管堵了吧？”待进了门，见楼上积水更甚，便红着脸退下，“四楼人家怎么搞的，害得楼下我们两家遭殃。”

史组长比我们更心急，初三一早就向社区要到四楼电话，开门清理积水。面对三位管道工的婉拒，她想出权宜之计：先堵住四楼落水管，又挨家挨户叮嘱“新年少用水”。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，本该烟火升腾的初四，我家厨房漏得更凶。史组长再次蹬着污水进了四楼，用拖把一遍遍清理积水。老伴攥着她的手哽咽：“若不是您，这年阿拉过不安生了。”她却笑道：“邻里同檐，便是家人。”

直到初五，史组长在邻居推荐下请来管道工程师，才终于疏通管道。八旬的我望着她被污水浸得发白的手，忽然想起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——她用二十余年的楼道组长生涯，织就了一张温情的网。在城市邻里关系日益疏离的当下，她用共产党员的担当和普通人的热肠，重新定义了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真谛。污水管里涌出的不仅是积水，更是一面照见人心的镜子：当四楼无人的家被淹，当管道工束手无策，是史组长以“一楼一楼敲门”的笨拙却真诚的方式，织就了邻里互助的纽带。

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小区。搬家那日，我向史组长告别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：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”她也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常‘回家’来走走看看。”

如今五六年过去了，每当梅雨季来临，老樟树的沙沙声总让我想起那方被污水浸润却暖意融融的楼道，还能摸到当年砖墙的温度，听到小区居民叽叽喳喳的回响，闻到厨房里“柴米酱醋”香味。有些人，虽不是血缘至亲，却在岁月里活成了彼此的伞，散发着人间最朴素的光，恰如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”般，在时光里酿成不散的温情。